

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方世南

摘要: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类生命危机,与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交织叠加,使人类安全问题愈益呈现出更加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总体性的态势,也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地表现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将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紧密结合一体化并予以系统谋划和实践,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任务。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一体化安全关系,以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自觉将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有机联结,用二者形成的总体性安全之力夯实我国国家安全基石,同时以胸怀天下的视野着眼于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目标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实现与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生命安全;生态安全

作者简介:方世南,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

中图分类号:X2;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2)04-0023-08

DOI:10.13658/j.cnki.sar.2022.04.005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类生命危机,与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叠加在一起,人类安全已经超越了传统安全界限而呈现出一种严峻而复杂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一体化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具有多种向度和多样性历史任务,然而,其最为基础的目标和任务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已经成为客观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生命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叠加的一体化危机状态在当今时代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单独的国家、民族或区域可以选择独善其身的封闭而自足、安全而舒适的孤岛式生存方式,人类已经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因此,将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化地予以谋划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ZDX2020)。

和实践,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一项重大任务。为此,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一体化关系,以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理念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自觉将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有机联结,用二者形成的总体性安全之力夯实我国国家安全基石。同时,以胸怀天下的视野着眼于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以建设全球性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目标迈向人类安全共同体,确保人类能够顺利告别生命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并存的“至暗时刻”,而走向与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同心协力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共享共同体中获得世世代代永续发展。

一、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体现了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本质要义

习近平指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①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他提出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全球安全倡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义和主要内容是人类安全共同体,而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深刻意涵是确保人类达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其主体内容和重大价值诉求是积极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确保生态健康、生态安全和全世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而这需要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予以保障。

倡导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提出的一个重大价值理念和实践方略,也展示了高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实现全人类福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全球价值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维度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内容作出概括:“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②这充分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全球性挑战而提出的促进全球安全发展的有效对策,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生命安全与全球生态安全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义和价值旨归,体现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提供的智慧与方案。

从其最初本意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中结成的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是构建确保人类整体安全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人的类本质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全面生产理论、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等多维度,考察人类社会在普遍联系、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共同进步中发展的诸多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的本质、人类解放、人类普遍安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诸多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作为“世界公民”,有着宽广的全球性视野。他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③的

①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2 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8-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4 页。

观点,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代表一切人的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个人特殊利益与人类普遍性利益的基础上构建的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使人自身的类本质与发展本质得到有机整合,从而能够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予以科学说明。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基于统治阶级少数人的个体利益、个体安全角度考虑,而与人类整体性利益、整体性安全相对立的“虚假共同体”学说,描绘了将个体利益自觉融入人类整体利益并有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实的共同体图景,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图景。恩格斯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人类面临的两大关系,指出解决这两大关系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①的境地,就是人类解决好人与自然矛盾以达到生态安全以及人类解决好人与社会矛盾以达到生命安全的境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因人类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安全需要而形成的集合体。人类命运是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两个要素,两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过程。就字面上来说,人类命运是人类之“命”与人类之“运”的有机统一。前者是人类的生命以及存在方式,后者则是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环境要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本意来说,就是要构建确保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一体化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利益和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倡议,目的是应对全球面临的生命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叠加形成的一体化危机,维护好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和超前意识,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引领人类摆脱共同风险挑战的使命担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如同德国思想家、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全球风险社会,而全球风险社会的历史境遇和所要追求的共同目标正是全球安全。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全球风险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予以应对,全球必须增强安全对策,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安全标准,构建防控风险的预警机制,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②当前人类面临的风险既来自于人与社会关系领域,也来自于人与自然关系领域。这些风险涉及面广,经常迅速传导、叠加放大,以一种风险综合体或系统性风险出现。其中,生态风险就是一种主要来自于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风险,是由于人类破坏生态而导致的生态系统不可逆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导致生态不安全,与此同时导致人类身体健康受影响甚至生命不安全。联合国2005年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描绘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与生态一体化不安全问题。该报告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水资源、煤炭资源、森林资源等都遭到了巨大破坏,1945年以来全球开垦的农田比18世纪和19世纪的总和还要多,全球过度农耕造成了土壤贫瘠和荒漠化,对海洋的污染导致了海洋“无生命区”的形成,地球气候亦出现异常变化。^③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全球病毒大流行更将人类带到了“至暗时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②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2页。

③ 郭林:《谁来拯救我们的环境》,《光明日报》2005年4月8日。

因此,只有着眼于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协调好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才能以人类共同体之力安然度过人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至暗时刻”这一共同的安全危局。共同体意味着安全,“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① 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因社会制度、精神文化、国民心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然而,人类具有“类本质”“类特性”,全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普遍价值诉求,如尊重生命、捍卫人权、保护生态、渴求安全、追求发展等。总之,全人类都有着基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应对共同危机的“类”安全这一价值共识,都需要达到在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上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要度过人类共同的“类危机”,走向“类安全”,必须依靠全人类共同的力量。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安全共同体,是由于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生命安全等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受到威胁,单一的民族和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必须依靠全人类在资源、力量、信息知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整合,构筑各发展主体自主、平等参与全球安全合作的治理格局,以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目标走向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一体化安全的人类安全共同体。

二、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彰显了人类安全共同体的重大价值

当今世界,影响安全的重大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习近平将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风险概括为:“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部分,从十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第十一个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④ 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大维度来看,影响安全的重大风险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来自自然界的重大风险和来自社会的重大风险,与此相对应的是两大类安全议题,即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以及两者集聚形成的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问题。生态安全与生命是紧密关联着并呈现出一体化趋势的全新安全,是同一个安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人类社会所构成的普遍联系网络中,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命存活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生态风险以生态系统的不协调、不和谐、不稳定现象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和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人的生命安全程度反过来也会直接影响生态安全程度。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只有人类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性、能动性,将生态文明建设好。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并不是两个漠不相关的关系,而是交织互动的,生命生态化与生态生命化已形成紧密交融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大了生态风险与生命风险一体化的重大

①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风险的发生概率。所谓生命生态化,就是生命与生态密不可分的联系。如同马克思揭示的那样,人类生命是依赖生态环境而产生和发展的,人靠自然界而生活,人身上的一切物质都来自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类智商再高明、体力再强健、科技再进步,都无法脱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态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体、种族、民族以及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否。同时,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否也直接影响到生态安全与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所谓生态生命化,就是生态环境与人的内在联系以及生态环境具有的生命特征。一方面,它是指与人类生命具有对象性关系的生态环境,从对人类的影响而言,其实也是具有思想情感和记忆功能的,自从人类生命诞生以来,生态与生命一直都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互动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揭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现象:“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②另一方面,只有人类生命安全了,才能从事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并以此促进生态环境与人类形成和谐共生、共荣共赢的良好关系,促使全人类迈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境界。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越来越超越国别的、地区的、民族的界限而具有全球化趋势,而“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③在生态危机方面,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灾难,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国家而是全人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全人类只有树立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的理念,自觉将“我”融入“我们”、将“个体”融入“群体”、将“人”融入“人类”,才能牢固确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心协力应对这场严峻的“类”危机。习近平说:“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④

在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态势下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实践活动、体制机制建设助推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是摆脱目前存在的阻碍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安全困境”的重要法宝。“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也叫“安全两难”,最早由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约翰·赫兹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如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加强自身防御的目的而增强军备,该行为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赫兹认为,各群体(权力的单位)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会强烈地驱使这些主体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所谓安全,“对权力的持续争夺产生螺旋效应,形成不断累积的安全的恶性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③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④ 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环”,^①其结果是人类安全这一公共物品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反而加剧了不安全。由此可见,要走出安全困境,必须依靠人类安全共同体。总之,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打破安全困境、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不二法宝。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以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为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有助于在全世界进一步强化“类安全”理念,消解“安全困境”,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价值目标。

三、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在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视野下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系统工程。“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和“人类安全共同体”这些命题本身就鲜明昭示出安全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过程性,需要全球在共同合作中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进行一场涉及安全理念、安全体制机制、安全实践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变革。

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安全理念创新是重要前提。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端正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是重要前提条件。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既按照全球生命危机与生态危机交织并存与一体化爆发的时代特点更新思想和转换观念,又按照现代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紧密融合形成安全一体化格局的新特点更新思想和转换观念,从而达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引领体制机制变革和实践方式变革的目的。

必须看到,现代社会发生的由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危机所引发的,必须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构建推动形成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时代课题,是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紧张关系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不友好态度以及人与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不友好、不合作态度,使得这一危机越来越趋向严重。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是令自己遭到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这种报复以生态不安全与生命不安全的双重性突出地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马尔库塞也认为:“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③这充分说明人类只有采取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呵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态度,才能确保生态安全,而只有生态安全了,才能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然界的生态安全又构成一个共生体,形成生态与生命一体化安全格局。因此,也只有将人的生命健康与自然界的生态健康、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然界的生态安全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才能推动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历史上的生态危机总是与生命危机紧密关联。霍乱是《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必须实施国际卫生检疫的三种人类烈性传染病之一,主要是由于人类接触了被人为污染的水源而引起的。该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致死率极高。而人

① 员欣依:《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③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1页。

类大流行的各种病毒,究其根源,都与人类过度干预自然、扰乱自然生态平衡有关。天灾背后往往有人祸,全球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一体化的发生,通常与人类之间不能展开有效合作密切相关。而这与缺乏“同一个安全”“同一个健康”的思想认识有关。“同一个安全”“同一个健康”倡导的是在整体性安全和整体性健康态势下才能获得个体的安全与健康。病毒的大流行和生态灾难的全球化,意味着只有采取主体际式的安全方式和健康方式,才能实现人类安全共同体。在病毒和生态危机面前,“只有你安全,才有我安全”“只有你健康,才有我健康”这种主体际式的安全和健康模式,已经成为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只管自身安全与健康的那种单边主义做法,既是一种短视行为,在实践中也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正如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说,“他们认为‘别人’会传染‘我们’,而没有意识到传染就存在于‘我们’中间”。^① 严峻的客观现实与全球新的安全形势,要求世界各国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整体安全而实现自身单独安全,更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自身单独安全。各国只有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呼应时代呼唤,合作开创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才能实现自身安全以及全人类的长治久安。只有以团结合作的共同体力量,才能应对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的一体化危机,达到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想目标,走向共同繁荣发展、安定祥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安全体制机制创新是根本保障。加强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视野下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体制机制建设,有助于通过发挥国际安全体制机制的规约作用,切实提高全球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一体化安全的能力水平。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格局走向全球安全共同体,体制机制建设是根本。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治理,全球性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一体化安全问题更需要完善并能够得到切实遵守的全球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当前,国际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全球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得到了极大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情报网等相关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等也发挥了促进作用。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和重要文件,对于确保全球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起着重要的规约作用。但是,如同习近平所指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②目前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③ 由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④“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⑤ 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时代之需,也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推进国际民主政治发展,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制度机制。各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⑥坚决摒弃旧的冷战思维,终止单边主义行为,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着力构建和畅通有助于生命安全与生态

① “Going Global”, *The Economist*, vol. 9, 2020, p. 7.

②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0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9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页。

⑥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安全的协商对话机制,以对话方式凝聚共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以合作共赢的态度推进环境治理、健康治理,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改善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发展,以面向未来的眼光解决现实中的生命危机与生态危机一体化带来的不安全问题,为国家间化解矛盾分歧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带来的重大挑战,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针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带来的生命危机、生态危机,必须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生态安全一体化的长效融资机制、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产品供给机制、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威胁监测预警与联合响应机制、资源储备和资源配置机制等,同时,加强全球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体系建设,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应对各类全球性生态与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要按照生态安全影响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安全反作用于生态安全的客观规律,健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一体化联动的预警响应机制,把增强对生态环境异常和生命安全异常的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当务之急,进一步完善全球生态危机、传染病疫情,以及突发生态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系统,改进对于生态危机、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不安全因素的敏感性和准确性。

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安全行为方式创新是关键因素。要优化以生命与生态一体化安全促进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行胜于言。安全的行为方式创新,首先在于要努力改变单个的、区域的、民族的、国别的安全行为而统合到国际性的安全集体合作行动上,以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合力助推全球整体性安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一体化安全问题有着极大的跨国性、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这决定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并且这一责任和使命还延伸至各种社会组织、跨国企业乃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世界各国需要以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价值理念,通力合作、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共同应对人类的安全挑战。在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生态危机与全球性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守望相助,凝聚力量共同战胜生态风险和疫情病魔一起袭来的挑战,确保人类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一体化安全中走向人类安全共同体。其次要努力促使全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企业行为、国民行为符合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一体化安全需要。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不同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二者的一体化安全程度。美好生活要通过美好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出来,而美好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有助于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一体化实现的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环保安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掌握科学的生态健康与身体健康知识,树立良好饮食风尚,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出行方式、旅游方式、餐饮方式等,都会体现出社会文明程度与人民幸福程度,都会充分反映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命质量和生态文明实际水平,展示出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的实际成效。

[责任编辑:廖先慧]